

为解读无字地书 不放过每一铲土

——考古学家许宏与郑岩对谈“考古的浪漫与温度”(下)

□许宏 郑岩

进入考古人视野才叫发现

许宏：我们不断地在说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跟北宋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有什么关系？刚才郑岩老师说了是日本人，古代中文学养极其丰厚的日本人，他们把《考古图》中的“考古”用来翻译考古学 archaeology 这样一个词。但是吕大临那个考古实际上是好古，跟古玩相关。所以“考古”这个词被引进过来之后，就与百年之前诞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联系起来了，刚才郑老师说了它与金石学的不同。进一步说，它的不同如果再浅显点说是什么？以前所谓对古物有兴趣的，全是冲着古物的价值去的，好看、经济价值比较高、上面有文字，是这样的。但是西方考古学者很决绝地说，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问，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也挖到有宝物的墓葬，我们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都会有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比如良渚、三星堆，但是考古人不是冲着这些宝物去的。这宝物当然有重要的信息，但是你看贝丘就是古人吃完贝类剩余的垃圾，我们认为它们也同等重要。我们研究这样的东西是为了探究广义的历史，是为了探究人类的过去。

至于主持人刚才问的遗址都是怎么发现的。这说起来非常遗憾，我们想找的重要遗址、好东西往往不是考古人发现的。因为考古人太少，你带着学术目的去找反而找不到。兵马俑是农民挖井挖出来的，良渚的玉器，三星堆的器物坑，大都是农民取土发现的。但是它的价值必须是专业人士才能意识到。所以我们说考古发现，一般都是以它进入考古人的视野，并被我们公之于学界，这样才能叫“发现”。比如说二里头，以前农民早就发现了，后来是当地文物干部知道了，他们领着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去，徐旭生先生写了报告并公布出来，这才被视为正式的发现，这是1959年的事儿。徐旭生他们是为了什么去的？是为了寻找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夏王朝都城去的，没想到就遇到这样一个大遗址，二里头这才走进了考古人的视线。

郑岩：就有点像动物学。逮到一头野猪吃掉了，这不是动物学家；逮到它解剖了，研究它，这才是动物学家。

许宏：对，这说得好。

考古学对认知的颠覆

主持人：我觉得刚刚许老师讲那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其实《考古中国》里面有特别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就想问问有没有颠覆了大家对于历史认知的，发现了之后突然觉得改变了我们曾经对于历史认知的发现？

许宏：在中国考古学诞生那个时候，我们对地下遗存所显现的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全是空白的，所以那时任何一个考古发现都是颠覆性的和填补空白的。比如仰韶，曾经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漫长的新石器时代，还有彩陶这样的东西，全部空白。我们的前辈后来又在山东城子崖发现了黑陶，比仰韶文化要晚，才知道还有黑陶文化。你看殷墟，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都邑、大墓、青铜器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空白。然后在四川，谁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居然还有三星堆这样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个过程中几乎都是在填补空白。当然现在空白越来越少，但也不是说没有了。我们现在许多发现，比如石破天惊的陕北石峁城，是在十几年前才发现的。所以说我们看考古学就是在不断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初期，几乎都是这种颠覆性的发现。

郑岩：我觉得除了填补空白，还有很多方面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比如许老师说的，我们过去中学课本讲的古史，大家往往感觉就是由不同的王朝先后相继排列成的一条线。有了考古发现，加上对文献的综合研究，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知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夏、商、周既是一种时间关系，也是一种空间关系。夏王朝末期的时候，商人已经起来了。商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周从西边兴起了。刚才说到三星堆，还有湖南、江西那些同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可能都

编者按

2022年3月10日晚，中信出版集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在抖音直播间就“考古的浪漫与温度”展开一场学术对谈。经主办方授权，本报上期《博物周刊》摘要刊发对谈文字稿上半部分，本期继续刊出的是下半部分。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考古中国》内页。



▲《年方六千》内页，书中插图均为郑岩之女郑秉语手绘。



是不同程度受到中原影响的地方政权，古书上基本没有记载。通过考古我们就知道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许宏：尽管我们学界在许多问题上聚讼纷纭、争论不休，但对于早期中国、对于中国上古时代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是多元一体，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在知道中华文明最初根本就不是单线发展进化的，而是一开始没有中心，一点一点中原中心出来了，滚雪球似的扩大，到最后形成帝国一体化。这样一个认知完全是中国考古学建构起来的。

主持人：是满天星斗的。

许宏：对，大家读我的书都比较熟悉。我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概括这个过程：第一个是满天星斗，是我们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说的，非常形象。然后从二里头开始，我认为中原中心出来了，是月明星稀的状态。这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什么叫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出青铜器的那几个坑跟殷墟是同时期的，但它就不归殷商王朝管。这叫有中心的多元。至于再往后就是皓月凌空，一体一统化的秦汉帝国，才开始奠定了古代中国王朝更迭的基础。从多元到一体，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脉络，是考古人把它建立起来的。

考古都用哪些工具

主持人：刚刚老师们也讲了很多特别有趣的考古故事，很多网友很感兴趣，考古人在考古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说那个小铲子，大家问这个小铲子碰到国宝会不会怕碎？在考古人手里面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许宏：我先给大家说一说，我刚才说考古人就是解读无字地书。为了解读无字地书，我们探索出了一整套绝活，从方法到具体技术到工具的运用，怎么合适怎么用。有一些根本不是考古人自己发明创造的，而是借用的。考古工作是从粗到细的，我们考古队分成三种人，最基层是我们发掘的时候请来的民工，就是农村的大爷大妈，他们最常用的是铁锹，做的是最基本的清理出土的活，属于体力劳动者。一旦进入了文化层，或者发现了遗迹现象，从那时候开始就

得精耕细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刮锹就开始派上了用场，它比你刚才说的小铲子还要大一点。一开始我们用一种工兵锹，感觉不好用，后来我手下的高级技师发明了一种工具，很遗憾，这玩意儿没法有专利权，因为它太容易做了。说起来简单，他用买来的菜刀，菜刀的刀刃都是上好的钢，把刀把去掉，在菜刀的中间部位安上一根跟菜刀垂直的铁棍，一把上好的、非常顺手的刮锹就做出来了。以前带学生实习，有学生问遗迹现象或文化层分不清楚怎么办，老师的回答就是一个字——刮，三个字——继续刮。直到比较清楚了才开始用那个小手铲，平头的、尖头的，一点一点尽可能小心地清理。但是如果遇到漆器，还有像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之类的器物，那个时候手铲也显得太粗笨了，就开始用非常精细的工具剔剥，比如餐刀，甚至用筷子削尖了一点一点剔清，如果还得更细，就用牙签来剔非常精微的地方，跟绣花一样，考古就是这么做下来的，所以有人说考古就是磨洋工哈。

主持人：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

郑岩：这个跟要提取什么信息有关系。现在要提取的这些信息和我们读书的时候要求也不一样。过去灰坑里、墓葬里的填土是扔掉的，现在要取样。

许宏：这我就有发言权了。是这样的，我经常愿意说一句话叫：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就像郑老师刚才说的，当时我作为年轻教师，那时正好是刚从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回来。发掘时老师或领队交代说除了土什么都要包括石头都得要，你得让老师、领队看看是不是制作石器的石片、石核，但是土不要，土全扔了，因为没有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就这么规定的。但是20多年以前我的同事赵志军老师从美国博士毕业回来，带回了浮选仪这样的设备。一旦有了浮选这个理念和方法了，就用水来冲洗土样，里面的粮食颗粒和狗尾巴草啥的，就都发现了。植物考古学家，他们自称“植物人”，在实验室里便用显微镜来观察我们提供的这些碳化样本，我们这才知道二里头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五谷齐备了，小米、黄米、稻子、小麦、大豆全有了，在这之

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也是一种信息提取。你刚才问的是怎么铲，现在讲的已经更高大上了，这东西跟手铲一样，设备、手段，背后是理念的变化。

郑岩：观念的改变，格局的改变。

许宏：最大限度地获取历史信息。

郑岩：考古学最早集中于艺术品的发现，就是要找宝贝。到谢里曼发掘特洛伊的时候，已经扩大到其他人工制品。现在不光是人工制品，还要研究环境。因为今天我们环境出了问题，我们想知道环境如何变化成今天这个样子，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发展，带动了方法的发展。

许宏：我记得在西方考古学中，发掘庞贝古城时已经注重所谓Context（背景关系）了。除了清理壁画、器具等好东西之外，开始注意它是在哪儿出的，这个房子、这个池子是什么功能、什么性质的，它们分别是哪一期的？这种关注就是科学化的过程。

主持人：研究得细致了，这是不是高科技带来的变化？

许宏：我觉得科技是第二步，它只是手段。因为本来科技手段可能都已经有了，但是你为什么不用它，你不用它是因为你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你要关心这个问题了，你才能想办法去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宝物之外，要搞清楚庞贝古城那些人当时是怎么生活的。不光是富人，还有穷人，一般的日用陶器他们怎么使用？谁跟谁的关系如何？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整个理念思维复杂化，逼着你在方法、技术甚至设备的层面都得跟上。

郑岩：即便是人造物，和以前的概念也不一样。博物馆的藏品要分级，我觉得这跟考古学的理念不完全一样。考古学是“众生平等”，一件破碎的陶器也很重要，一块动物的骨骼也很重要。

许宏：我作为考古队长，绝对不能说出土的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没有不重要的。

从考古现场到博物馆

主持人：我正想问，刚刚老师说的出土文物上面还沾着土，但是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都是溜光水滑的、干干净净的文物。就像郑老师《年方六千》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文物，有的是国宝，有的可能感觉并没有很重要，所以很好奇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些国宝，在策展、选品的时候是怎么分重要性的？在您二位看来，他们是怎样排序的？

郑岩：博物馆的历史就很复杂了。我们从欧洲说起，近代博物馆的起源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关。改革带来的一个极端的倾向，是对天主教教堂的冲击。在那些新教徒看来，教堂里的圣物、圣像都不能引导人进入天国，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激烈的圣像破坏运动。那些被打碎的圣像、圣物，它的宗教价值被否定了，就开始有人收藏它们，并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和研究。这些收藏后来发展出艺术史的研究，也变成公共教育的一种手段，博物馆就出现了。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为收藏品的文物和艺术品，被赋予一些新的价值，比如文人从中体会到的“古意”，一种审美化的历史感。但这些藏品是偶然获得的，不系统的，它和原来历史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和遗忘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博物馆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杯子里盛着茶。但是，考古学研究那个杯子时，要想到茶。唐人的瓷器为什么南青北白？这既与技术有关，也和当时茶汤的颜色有关。我们现在如果把茶倒掉，那件瓷器的美感也就不完整了。今天的艺术史也是这样想问题的。

许宏：郑老师刚才说的南青北白的茶具，我想你刚才说过器物都洗得溜光水滑了。我们现在刚出土的器物，如果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允许马上就洗。因为现在很有可能从一个陶器的内壁上边提取到酒或者盐的成分。你如果全洗完了，这个信息就没有了。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刘燕